

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

瓦窑堡旧事

为边区百姓和基层干部立传
为远去的延安时代作注

黄琛◎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

瓦窑堡旧事

为边区百姓和基层干部立传
为远去的延安时代作注

黄琛◎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窑堡旧事：陕甘宁边区“留守儿童”记忆 / 黄琛
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6

ISBN 978-7-5034-6391-4

I. ①瓦… II. ①黄…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 IV. ①K269.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417 号

图书策划：方云虎

责任编辑：窦忠如 方云虎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29236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献给瓦窑堡的父老乡亲 and 娃娃们：

不要忘记过去，
永记先辈恩情。

目 录

引言 从吴家坪到瓦窑堡	(1)
一、刘家院	(12)
二、恩父刘世昌	(21)
三、后河滩	(35)
四、子长“一完”	(44)
五、放学以后	(59)
六、暑假——吴家坪、外爷和我	(72)
七、要打仗了	(85)
八、跑反（上）	(96)
九、跑反（下）	(110)
十、国民党统治下的瓦窑堡（上）	(125)
十一、国民党统治下的瓦窑堡（下）	(139)
十二、城外的战斗	(153)
十三、革命功臣郭立本传奇	(165)
十四、光复以后	(187)
十五、难熬的冬春（上）	(198)
十六、难熬的冬春（下）	(208)
十七、留住儿时记忆中的瓦窑堡城	(219)
十八、告别瓦窑堡前后	(244)
后记	(260)

引言 从吴家坪到瓦窑堡

瓦窑堡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属分区子长县的县城，位于延安正北 90 公里，地处陕甘宁边区的腹心地带。1949 年以前，城里只有 800 多户人家，但在当时的陕北，算是“大城市”了。

我不是生在瓦窑堡的“城里人”，而是生在城东 15 里吴家坪村的“乡里人”，五岁（虚岁，以下按乡俗均说虚岁）那年才进了城。

我怎么会从吴家坪村跑到瓦窑堡城里去的呢？

1935 年以前，瓦窑堡城周围已成红区，吴家坪所在的东区更是老红区之一。几十户人家的吴家坪，就有 22 人参加了红军，其中 11 人血洒战场，再也没有回来。刘志丹指挥的吴家寨子战斗、杨家园子战斗和马家坪城斗，都发生在吴家坪东边很近的村庄。这三次战斗，共歼敌 1000 余人，缴获的大批枪炮，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加红军。他们扛着钢枪，自豪地唱道：

人吃好面马吃草，

看我们当红军好不好。

1935 年 10 月 2 日，瓦窑堡“城开”，国民党驻军逃往绥德。第二天，中共陕甘晋省委从永坪迁入瓦窑堡，几天以后，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成立。

11 月 7 日，洛甫（张闻天）率领长征过来的中央机关人员数百人抵达瓦窑堡。随行的有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刘少奇、罗迈（李维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子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子长县志》第 19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引文，只注县志名和页码。）

在这几百名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人群中，在林伯渠身旁走着一名赤脚片子穿麻（草）鞋的年轻人。他牢牢地抓着马缰绳，注视着前方。他瘦高个子，浓眉大眼，大耳朵，厚嘴唇，显得格外朴实、坚强。他就是从福建长征过来的

红军战士黄祥墟——三年后，他成了我的父亲。

父亲1911年9月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县铜砵村一个贫农家庭。因欠人债务，爷爷把家里的田全部典当后又租回来耕种，除种田外，还帮人造纸和做茶。奶奶是个极能吃苦耐劳的人，她除操持家务外，经常砍柴卖，还给别人挑纸到县城，以挣点工钱贴补家用。两位老人都非常拥护革命，爷爷还挂起红带子当过农会委员。

由于家贫，父亲中断了小学的学习，十五岁给村里富农当长工，十六岁开始当造纸工人。

1930年春天，父亲到区苏维埃政府当宣传员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天，白军占领龙岩，父亲调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当战士。1931年夏，又调到福建省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当班长。同年冬，经闽西革命领导人之一、时任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郭滴人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1932年春，在毛主席率领红军打漳州的过程中，龙岩又获解放，郭滴人带我父亲一起回本县苏维埃工作，任县苏维埃执行委员、文化部长。同年夏，父亲抽调至省苏维埃训练班受训后，回本县任第五游击大队政委。他紧密联系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摸清反动民团的行踪，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其一股一股地消灭干净。此后，他调任第六游击大队政委。

1932年8月，他率第六游击大队在上杭虎岗阻击敌人时不幸受伤，住进了省军区医院。

1933年春，父亲伤愈后，到福建军区指挥部随营学校政治连学习3个月。同志们选他管理伙食。在工作中，他和三排长查出管理员贪污伙食费，用来和校部一位卫生员谈恋爱。这本是一起小小的贪污案，但在当时“左”倾思想指导下，却被校领导搞成了一起政治案件：管理员在严刑逼供下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注1），并供出我父亲和一、三排长都是同伙。办案的领导居然盲信这些逼出来的口供，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并罚做“苦役”。父亲说，他是在“肃社”余波时被“肃”的，如果赶上高潮，恐怕早就没命了。

父亲从随营学校被遣送回福建省政治保卫局“服役”（郭滴人这时已不在保卫局工作）。不久后奉派护送保卫局侦察部长曹汉清去瑞金另行分配工作。到瑞金后，中央红军已决定远征，他不能再返回闽西苏区了，即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到，被分配到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身边工作——当马夫。不久即跟随

改任红一方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后又改任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踏上了长征路。在漫漫长征路上，他和林老的警卫员黄秋胜一起护卫着林老，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一起走到了陕北，走进了新的红都——瓦窑堡城。

父亲是“背着黑锅长征的”。

在长征路上，1935年5月金沙江畔的会理城下，父亲偶遇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郭滴人。此时的郭滴人，在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备受打击后，正在三军团做宣传鼓动及地方工作。战友相逢，格外亲切，父亲热泪盈眶，郭滴人紧握着他的手，鼓励战友要努力工作，坚持到底。根据当时的情况，父亲也难以向老上级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两人从此再未能见面。1936年11月18日，郭滴人因积劳成疾，在陕北保安逝世，年仅二十九岁。（注2）



郭滴人同志遗照

在长征路上，父亲曾向林老的警卫员黄秋胜提出过恢复党籍的事，他请示后回答父亲说：行军路上不好解决，等到根据地后再说吧。

进入瓦窑堡后，父亲正式向组织提出了洗清诬陷、恢复党籍的申请。

父亲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初步解决：重新入党（注3），福建的问题留待福建解放后再解决（注4）。

时年，中央红军进入瓦窑堡不久，贺子珍被任命为印刷所所长，任务之一是为财政部印制苏维埃票子。当时纸张奇缺，代用品韩城的布也断了来源，领导上要求尽快生产出纸来。父亲是造纸工人出身，长征路上和林老、谢老一起行军，他们了解他的表现和技能，就把他从林老身边调到毛泽民任部长的国民经济部下属国家贸易总局筹办造纸厂。谢老当时兼任经济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和贸易总局是同一个党支部（局长钱之光兼任支部书记，毛泽民妻子钱希钧是组织委员，谢觉哉是宣传委员）。谢老了解到吴家坪有个张振华办的私人造纸作坊，就决定与他合作办厂，并作了我方负责人黄祥墟的重新入党介绍人。重新入党后，父亲被任命为中央国民经济部吴家坪造纸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委员长（厂长是张振华，老乡们称父亲为指导员），该厂同时受国家贸易总

局和经济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父亲接受任务后，立即奔赴吴家坪。

吴家坪有个建于1931年的天主堂，它是由一大四小5孔窑洞装饰窑面后形成，到1935年“闹红”高潮时，已无教徒参加活动，姓薛的神父虽留在吴家坪，但教堂用来作张振华的纸坊和学堂了。张振华的纸坊规模很小，晒纸完全靠阳光，费时长还要受天气影响。



吴家坪天主堂全景

父亲到吴家坪后，与张振华密切合作，很快造好了新的大石碾子、父亲还带来了福建的火墙烘纸技术，在天主堂的当中大窑里砌起了几道火墙，可使纸产量大幅提高。

准备工作就绪后，纸厂于1936年1月开始生产，上级陆续派来了长征老同志胡仁（湖南人）任副厂长、邱端阳（江西人）任会计，还调来了清涧县的党员马希温，加上

纸坊原来的党员吴东满等人，纸厂的党支部建起来了，职工达到二十多人。业务忙起来后，天主堂的薛神父也被吸收进来，到洛川一带帮助收购原料。

据《子长县志》记载，吴家坪纸厂在投产4个月时间里，共“生产土纸2000刀”（每刀100张。此前该县年生产麻纸3000刀。）。完全解决了印制苏票的纸源问题。为此，父亲受到了上级的嘉奖。为了防止敌人伪造苏票，父亲还在纸浆中掺入极少量的黑色羊毛做暗记，要仔细看才能发现。

凡有青年男女的地方，就会有爱情。

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里，一下集中了二三十个年轻人，其中还有几个说话叽里呱啦的“中央红军家”，天主堂一下热闹起来了。年轻女子（陕北话专指没结婚的女孩，结了婚的叫婆姨）们有事没事都爱到天主堂转转，其中就有

惠玉兰——三年后，她成了我的母亲。她是后沟里穷人惠家最小的女子，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已成家，她16岁，曾在天主堂办的学堂念过几天书，认下些字，在当时算个开通女子，按当地习俗也该出嫁了。去的次数多了，纸坊的有心人从中看出了“秘密”，就开他们的玩笑，更有热心人到惠家撮合。几个月后，经外爷（读音“卫义”，即外祖父）点头、领导批准，在桃花初开的时候，从福建远道而来的红军战士黄祥墟和穷人家的陕北女子惠玉兰“终成眷属”。这就是那个“千里姻缘一线牵”吧？他们哪里知道，未来的岁月里，漫长的苦等和无奈的分离在等着他们。

6月中旬，父亲接到秘密通知：瓦窑堡要让给张学良部队，纸厂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到城里集中待命，纸厂交给私人办。父亲带着人撤离了，母亲留在吴家坪。

6月21日，陕北土皇帝井岳秀下属的张云衢营突然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保安，而父亲被派到吴旗一带购粮、设货栈。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高桂滋部（八十四师）的一个排进驻吴家坪，在临川道的瓦窑山上修了炮楼，并强迫老百姓在炮楼下修起寨子。晚饭后，全村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必须住到寨子上，第二天早上才能下山，不去要罚。夜里庄子里只剩些婆姨娃娃；地主夺回了被分的土地，外爷过去的“东家”从瓦窑堡回来追讨“欠租”，躺在炕上几天不走，还强要好吃好喝供着他；村里建了保甲，进出村子必须报告，还不断地查户口。白色恐怖笼罩着吴家坪。

母亲串联了四个红军家婆姨想去南边找亲人，不幸走漏了消息，被白军抓了起来。幸亏家里人请有面子的人出来求情作保，才以痛打二十手板、不许离村了结。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瓦窑堡由国共双方共管。不久后，国民党驻军撤走，吴家坪又成了红区。

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父亲调回国家贸易总局当管理科长。

1937年6月，父亲调到红军妇女学校任队长兼政治教员，把母亲接到该校参加了红军。红军妇女学校设在延川县云岩镇，主要是集训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西征失败后回来的人员，四川人居多，母亲说她的排长就是个四川疤子（麻子），“可厉害哩”。

穿起军装扛起枪，站岗、放哨、上课、出操，9个月的红军妇女学校生

活，成了母亲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红军妇女学校旧址云岩镇

在云岩，我的父母照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那时我在母亲的肚子里，这从照片上紧绷的衣服似乎可以看得出来。照相的是“延安府松茂照相馆”的人，母亲穿的长袍是从白区来的一位女教员那里借的。这张照片能保存下来，也是历经风险，这是后话。

1993年1月，我回瓦窑堡探望老母亲，母子俩说起过去的事情。在我的请求下，她唱了一段红军妇女学校的歌：

青年同志们，哎哟咳，我们准备好，每天来出操。

很快地大家到操场，学政治学文化，越多越好。

大家来比一比，哪个进步，争做青年的模范。

无限准备好，领导各地的青年。

胜利归我们。

1938年春，父亲调中央党校学习。夏初，红军妇女学校迁往酃县，这时母亲已快生我了。父亲听到消息，追上队伍，经请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周杨同意，母亲离队回到吴家坪。

我满月后，由外爷送我们母子到延安，借住在吴家坪邻居羊圈的后父家（位于桥儿沟天主教堂旁。教堂是中央党校校址）。8月，父亲从中央党校毕业了，在中央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他让我们母子借住在清凉山黄秋胜主管的印刷厂。11月，父亲被分配到太行山抗日。从此我和所有抗日出征将士的子女一样，成了“留守”陕甘宁边区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延安的托儿所、保育院和保育小学里，但也有许多散落在边区各地的老百姓家中，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临行前，父亲将我们母子安排到延安城南柳林村的中央组织部托儿所，并请长征时的战友黄德泉照顾。长征时，黄德泉在财政部挑金子，这时他在延安办合作社。（注5。后来，黄德泉也去了前线，和我们失掉了联系。）

母亲在托儿所当保育员，每天用冰冷的水洗几大盆尿布、衣物，这她能忍受；而我被放在窑里和其他婴儿一起“保育”，不许她看，更不许她抱，这她接受不了。她说：“托儿所里都是刚养下来那号猴（小）娃娃，木板上隔出些槽槽，一个槽里边放一个。那时候你还小哩，才4个多月嘛。”她决定抱着我回吴家坪。

黄德泉送我们母子走到安塞县的山上时，听到延安城方向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大爆炸声。这一天是1938年11月20日，上午日本飞机第一次大规模地轰炸了延安。从此，母亲脱离了革命队伍，开始了后来的苦难生活。多年后，当我问她后悔不后悔时，她沉吟片刻说：“不后悔，要不是那天走了，早没你了。听说那次托儿所也落了炸弹，炸死不少人，一坩瘩一坩瘩的人肉贴在墙上。”母亲是为了疼爱我而离开托儿所的，我不能再说她什么，就让她坚持这个理由、保持这分心态吧。

回到吴家坪，我们母子住在外爷的窑里。外爷外妞（读音“卫妞”，即外祖母）疼爱我们，可惜他们这时已不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而这个穷家也确实养活不了两个吃闲饭的人。

母亲每天上山下沟劳动，把我丢给外妞，当外妞也出去干活时，我就一个人在院子里爬来爬去玩，一次竟被老母猪咬破了屁股蛋子，幸亏母亲挖了一大筐苦菜回来看见，赶开了母猪。

更大的苦恼是精神上的：父亲走后杳无音信，而当家人认为小姑子是“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断无理由赖在娘家，姑嫂矛盾日积月累，竟致拳脚相加。

1939年6月的一天中午，又一场撕打后，母亲躺在外妞家炕上痛哭，我从灶台上爬下时，一条腿掉进了刚做过饭的灶坑，怎么也爬不上来，疼得大哭，母亲竟赌气没理这回事。还是在仓窑门口干活的外妞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跑回来一把把我从火坑中拉出，才救了我这条小命，可惜一只脚已严重烧伤。



外爷外妞住的窑，右侧是仓窑

当年十三岁的二表哥惠玉，目睹了当时的情形。他说：“你疼得用手拨拉伤脚，姑母急得哭。前院、上下院的人，很快都知道你烧了脚，跑来看望、出主意。有人提出把黄土圪瘩烧热了，在醋里泡软，然后敷在烧伤处，可以消炎，当时就先这么做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是母亲和外甥两个人没日没夜地轮流抱我，后来用大黄根捣烂敷伤口，才避免了伤口感染，大体保住了这只脚。那年我虚岁两岁，刚好一周岁，还不会走，只会爬。

母亲说：“脚好了，我看下不能一搭里盛（住）了，就另盛下了。”

“安家哩，什么也没有，到席子沟你姨家，给的洋芋（土豆）、稻黍米（高粱米）、米、红豆角角，才安得个家。直到第二年，公家才给优待上。一年就给两石谷、给个石炭（煤），再什么也没有，就指望我纺线织布。”母亲说：公家的优待粮要靠“拥红官”（贫农会长）杨安国摊派，一家家去收，不是都能收来的。

我们母子第一次借住的是下院羊圈家的边窑。那是个里外套窑，要从主家住的当中窑进去后，往左穿拐洞过去。原来是人家的仓窑，多年没盛人了，再加上这孔窑紧靠上、下院之间的雨水水路，易潮湿。石窑的窑顶、墙壁上的土已掉落很多，石头间出现了许多缝隙。母亲说：“烂石头碴子好长蝎子。夜里蝎子把你的脑（头）蜇了，要寻（找）蝎子连个灯也没有。把你疼得嚎哩。”这里“羊圈家”的“羊圈”是个人名，因他妈在羊圈里生了他而得此名。在我们母子最困难的日子里，羊圈家借给我们一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真是极大的恩情。（此后几十年里，我和他家三代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他们一点帮助，更主要的是珍惜这份昔日的感情。2007年9月，我随“情系延安寻访团”回延安访问，抽空到羊圈搬至桥儿沟的家去看望，羊圈的老伴儿还健在，见到我，高兴得拉着手不放，可惜羊圈已经去世。）

大概两年后，我们母子搬到下院另一头的边窑。那是聚财家的，紧靠着羊圈和牛圈，门前有盘石碾子。母亲说：“那个窑连个门也没有。一黑劳（一天夜里），门里爬进来一根蛇我也不晓得，还是聚财的老子回来看着门框上爬着一根蛇对我说了，我才把蛇撂了。我怕得不行，在门口放（生）上一堆火。”

在第二个窑里，我们母子住了两年多，还是一直收不到父亲的信。而一些谎信却不时传来，并且越传越像：老黄在路上翻车摔死了，有人还看到他的坟堆，上边插着他的牌子。母亲开始时不信，并且不断到区政府去打探。起初，

政府的人说他们也没消息，等着吧。几年以后，他们也说怕是真死了，不一定等了。母亲不甘心，还是等着。直等到第五年发生的一件事，才改变了我们母子的生活。

1942年，窑主家种了些洋烟（鸦片。陕北历史上一一直种鸦片，1943年以后边区政府严厉禁止了），夏天的时候，雇了些人来割洋烟。这些人占了我们住的窑，我们只好住在院里的碾盘上。那时，有狼在村里出没，为了给我们壮胆，外姐夜里跑来陪着。

母亲的娘家回不去；五年了，公家仍然没有父亲的消息；现在，连这暂借的栖身之所也被人占了。看着在碾盘上熟睡的我，母亲思前想后，愁得不行，一坐就是一整夜。四周是黑沉沉的山峦，眼前是寂静的院落，生活似乎走到了绝境，出路在哪里？母亲很受刺激，她绝望了。终于她私自托同村的山



七十一一年前的碾盘还在原地，碾子没了西人吉焕星，在城里寻了姓刘的一户人家，带着我走了。母亲说：“走时，窑里还有半机子布，没织完……”

就这样，我在1942年的夏天，从吴家坪村进了瓦窑堡城，成了瓦窑堡城里人。

父母的分离，始终是我抹不去的心酸事。1949年，我被找回了父亲身边，结束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却从此远离了生身母亲。2000年3月，母亲以80岁高龄离世。把她老人家扶上山（陕北话即埋葬）后，我从瓦窑堡回到北京，与九十岁的老父有一场对话：

“子：你什么时候离开延安去太行的？传说你们去西安的路上翻了车，你摔死了。在什么地方？”

父：大概是1938年11月。中央组织部派我们一批人去前线。是一个车队，一辆车在洛川附近掉到山下了，死伤了一些人，不是我们那辆车。

子：传到吴家坪的消息说你摔死了，有人还看到坟堆上插着你的木牌子。

父：车是在中部（黄陵）前翻到山下的。我们车队到西安后又过黄河去了山西。我到西安后给你母亲寄过信，还给你寄了奶粉。

子：可能没收到。如果收到奶粉，我母亲肯定会给我讲起的。我是1946年底才吃到两块延安产的饼干，奶粉太珍贵了。

父：1945年初，太行二地委书记陶鲁笏回延安开七大，我托他打听你们母子的消息。他在延安托人打听了，回来后说你母亲已经另结婚了。

当时我也没经验，其实可以通过国民党的邮局早些写信联系，也许能联系上。

以前我也托人回陕北时打听消息，但托的人没过黄河就被敌人打回来了，还差点送了命。”

这样看来，如果母亲忍过了那个夏天，再熬上三年，那根断了的红线就会接上了。

可是，“如果”有什么用呢?! 无奈的分离才是真实的。

注1：“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闽西大搞“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所谓“肃社”运动，残杀了数千忠诚的革命同志，最后甚至危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张鼎丞等同志。邓子恢、郭滴人等采取断然措施处决了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改组了政治保卫机关，才基本上刹住了这股邪风，但闽西各地还时有发生破获和审判“社会民主党”的案件，直到主力红军长征为止（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14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注2：1956年10月13日，郭滴人的骨灰从陕北移葬于闽西烈士纪念碑后山。墓碑



左：父亲 右：郭壮友

上刻着“闽西苏区创造人之一——郭滴人烈士之墓”。1978年春节，父亲在离家43年后第一次回故乡，时年67岁。他带我一起拜谒了自己的革命领路人郭滴人同志的安息之地。1998年，他写了8万字的《郭滴人与龙岩革命》一书，深情回忆郭滴人同志，由龙岩市新罗区（原龙岩县）区委出版。2005年秋天，他以九十四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回到故乡，郭滴人同志的儿子郭壮友听说后，登门来拜访他。第二年，父亲就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

注3：重新入党的经过，除听父亲说起外，在“文革”期间陪父亲拜访钱希钧（毛泽民夫人，钱之光之妹）时，也听她亲自说过。她说：“前些时候有军代表来调查你，我告诉他们是谢老介绍你重新入党的。他们说谢老记不起来了，我说他年纪老了，可能记不起来了，我记得清楚，是我们支部发展的。当时中央有决定，凡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本人申请，都可以入党，在中央苏区有遗留问题的，以后解决。”她还关心地问：“他们没再找你的麻烦吧？”父亲说：“没有。”钱希钧当时已是中央某部的副部长，可她的穿着打扮和居家老太太一个样，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06年，父亲逝世后，谢老的老伴儿王定国送来一个用绿树枝、青草和白色鲜花自制的花圈。我们把它摆放在父亲遗像的正前方。

注4：1956年，父亲当选中共八大代表时，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决定，恢复1931年的党籍。另外，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量、认真调查，福建省委最后认定：福建苏区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并为一切遭诬陷的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

注5：《谁主沉浮》一书说：毛泽民在十五大队当政委，钱希钧也在十五大队。黄德泉的名字是毛泽民给起的。国家银行跟随毛泽民长征的原是14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8人。一百多名运输队员，只剩下黄德泉和邱端阳两个班长了。（第572—574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一、刘家院

我们母子是怎么进瓦窑堡城的？骑驴、步行？城门、城墙是什么样？街道、店铺是什么样？……对这些，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留下。

我对瓦窑堡的第一个记忆，发生在后河滩刘家院。那一天，院子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傻呵呵地站在两个窑洞之间的窑腿下。这时，过来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小孩，拉起我的手和我说话。他身穿黑色的新衣服，头戴瓜壳帽，帽顶上的那颗红圪塔特别红，伴着满脸的嘻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凭当时的记忆和现实中的人与物对照，判断出那是我母亲改嫁到瓦窑堡刘家时发生的情景。

六十九年后，我拜访七十九岁的聚财，求证我的这一记忆。他说：“对着哩！大嫂过门时吃了糕、饴饬，一大家子人，还请了些大哥的朋友。我拉你要，只记得你一只脚烧了。”

长大后我得知，这个聚财和我有相似的经历：他的母亲也是带着他改嫁到刘家院的，他也改姓了刘，但他的后父是我后父的二叔，所以他比我高了一



杨(刘)聚财近照

辈。他长大后也回了亲生父亲家，并改回了原来的杨姓。我们两人虽无血缘、亲戚关系，但因为小时候一起生活了几年，感情颇深，每次回瓦窑堡，我总去看望他。他一辈子搞卫生防疫工作，现在虽年近八旬，却满面红光，满口白牙，身体壮实，头脑清楚，只是耳聋得厉害。

我采访他，要事先给他书面提纲，

否则交谈起来真是累死人。他笑着说：“聋了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